

酷儿理论视角下新加坡英语文学中的“他者”

——以《亚洲男孩》和《月升，日落》为例

汪定辉 陈 剑

昭通学院 云南昭通 657000

摘要:《亚洲男孩》和《月升，日落》是阿尔费恩·本·萨特 (Alfian bin Sa'at) 和戈帕尔·巴拉塔姆 (Gopal Baratham) 的代表作。使用酷儿理论进行分析,发现当代新加坡男同性恋群体的形成受到政治、历史、种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该群体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包括受影响的“他者”身份 (the influenced other), 被剥削的“他者”身份 (the exploited other) 以及被排斥的“他者”身份 (the abandoned other)。这两部作品揭示了同性恋群体存在的事实,同时也提醒着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当下社会中形成同性恋群体的背景和对待他们的态度问题。

关键词: 酷儿理论;《月升,日落》;《亚洲男孩》;“他者”身份;同性恋群体

引言

新加坡英语文学致力于将西方文化与新加坡文化融合,并以超前的姿态引领新加坡文化成为东南亚文明的重要支柱。在追求性别平等和重视人口发展的过程中,新加坡作家们不可避免地探讨了性别和性倾向问题,这也成了当代新加坡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同性恋群体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在文化和人口层面上应对同性恋群体的出现?这些问题在现当代新加坡英语文学中得到了许多男性作家的独特见解和亲身经历的呈现。

一、男同性恋身份与“酷儿”书写

阿尔费恩·本·萨特是新加坡英语和马来语剧作家、诗人和短篇小说作家。萨特以其充满政治色彩的作品而闻名。《亚洲男孩》三部曲包括:第一卷《梦幻》(Dreamplay),第二卷《地标》(Landmarks)和第三卷《快乐结局》(Happy Endings)。萨特更加注重用人道主义的手法刻画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并关注那些被剥夺公民权的社会阶层。萨特本人曾表示,他想代表那些“工人阶级的秘书……那些运气不佳、不擅长言辞”的人^[1]。

基金项目: 2020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西方古典美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现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QN202037)。

作者简介: 汪定辉(1991-10),女,汉族,云南昭通人,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跨文化交际。

此外,萨特的作品也记录了新加坡少数族裔(尤其是马来人和印尼人)对政治、种族、性别等社会问题的态度,试图打破负面的种族刻板印象^[2]。

戈帕尔·巴拉塔姆是一位新加坡作家兼神经外科医生。巴拉塔姆的文学作品源自他个人经历中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以及对文艺复兴的渴望,这些经历赋予了他作品独特的观点、态度和价值观。巴拉塔姆的故事中存在一种内心矛盾,因为他将对人物的评判权交给了读者。这与他对待事件、人物、行为和关系的同情理解相一致。巴拉塔姆在1991年获得了东南亚作家奖。他的作品以新加坡社会为背景,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誉^[3]。

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指出社会中存在一种压制性结构,监管着关于性和性取向的话语,并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因此,异性恋被接受为正常,而同性恋(或酷儿)则被污名化^[4]。性和同性恋问题对人口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反映了社会对待此问题的集体意识。萨特和巴拉塔姆在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关注性别身份和行为,通过文学为男同性恋群体发声,试图引起社会对性和同性恋问题的关注。酷儿理论的核心是关注被边缘化的酷儿群体^[5]。《亚洲男孩》和《月升,日落》通过颠覆性的后现代方式质疑权威对“酷儿”生活、政治和身份认同的支配。

二、政治与殖民中的“他者”

在《亚洲男孩》三部曲中,作者运用后殖民叙事手

法，强调了在独特的殖民历史背景下，作为新加坡人，他们很难清晰地认识自己在政治身份和个体性别身份的选择中所面临的困境。“亚洲男孩”这个主题凸显了男同性恋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大量使用新加坡英语俚语刻画了男性之间的私密对话、身体器官和心理活动。作者以鱼尾狮作为隐喻，表达了新加坡人与这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的融合。鱼尾狮是由岸上的雄狮和水中美人鱼杂交而来的生物；这种后殖民修辞使不同的元素相互同化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既熟悉又具有威胁的全新存在。

实际上，2000年《亚洲男孩》第一卷出版时，新加坡禁止成人之间的同性行为；媒体和影视作品也很少涉及此话题。而萨特却在该书探讨了男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社会关注和政治问题，为处于边缘地位的同性恋者代言，同时为他们建立集体认同感打下了重要基础。第一卷以露营和嘉年华的形式表达了男同性恋的“他者”身份困境的根源；强调殖民历史和政治身份对“他者”生存的直接影响。在第二卷中，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在控诉政治和殖民文化对人的性别选择和性别需求的忽视。剧中的角色不断在幸福与痛苦、愤世嫉俗和希望之间徘徊^[6]。该作品引发读者对同性恋行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思考。作品的主题清晰地表明，徘徊和不确定性是现当代新加坡同性者生活中永恒的困境。

同性恋群体的存在表明，新加坡社会仍然存在着性别歧视和偏见。很多新加坡英语文学作品都探讨了同性恋议题。比如，著名的同性恋作家黄益民的《情人清单》和《倾盘求光》，以及黄毅圣的诗集《最后的男孩》和《他们》，都反映了同性恋群体普遍面临的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等问题^[2]。在《亚洲男孩》三部曲中，萨特以一种幽默而暗喻的方式描绘了两性关系和同性关系，并通过现实主义批判的手法试图唤起人们对被边缘化的“他者”群体的关注。同时，他也重新审视了身处特殊殖民历史和政治文化中的新加坡人身份以及新加坡男同性恋者身份中的困境。萨特代表新加坡现当代男性作家开启了新加坡男同性恋者对于身份认同的斗争。

三、族裔身份与种族文化中的“他者”

《月升，日落》对男同性恋的呈现相对于《亚洲男孩》更加含蓄。标题“月升，日落”是一个隐喻；揭示了新加坡族裔男性在种族问题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甚至是生命危险。这部作品，巴拉塔姆讲述了主人公梅

农（Menon）的屈辱经历和心路历程。梅农的母亲是来自中国福建的华人，而父亲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马来人。小说解释了梅农名字的由来，“How Kun”是美丽的意思^{[7]（22）}。梅农的存在象征了新加坡族裔群体的“混合”。在新加坡文学中，“混合”这个词很常见。一方面，它意味着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殖民和族裔文化的入侵；还可以涵盖情感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词都揭示了当代新加坡人在身份和族裔认同上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恐惧和迷茫。

有学者认为巴拉塔姆试图将英语的文化参数延伸到其特权和政治遮蔽的功能之外。为此，他的作品都探索了新加坡官场统治下的肮脏弱点；同时也提出了文化禁忌话题：如艾滋病、同性恋恐惧症、非法性行为、道德准则的僵化以及审查制度的问题^[8]。在《月升，日落》中，梅农自称在遇见女友瓦妮塔（Vanita）时，自己还是个男孩子；这意味着他倾向于男同性恋，并为后来他对好友加法里（Jafri）的“仰慕”埋下了伏笔。梅农没有肌肉，皮肤苍白，缺乏体毛和汗臭，毫无阳刚之气。然而，他又强调自己的鼻子、脸型和器官异常阳刚，与西方对东方男性器官发育的刻板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反差暗讽了新加坡人对东方人形象的刻板观念，同时抨击针对个人身体和性别的攻击与歧视。

梅农报警后，出警的警官把他抓去审问。审问时，警方拒绝梅农陈述事实和辩护的机会。为梅农体检身体的警官对他的裸体表示嫉妒，并因此臆断他是变态的强奸犯和杀人犯。因此，梅农被一顿毒打，诱供和逼供，被不断折磨。作者写道“毕竟，我们的自由派、心软的美国朋友把强奸犯的蛋蛋割下来了”^{[7]（48）}。借此，作者有意批评政府僵化的形式作风，以及对待不同族裔人群的刻板印象和不公正态度。道德准则僵化和制度审查问题同时导致了同一群体间的秘密交流，并且难以获得合法权益和文化身份认同。毫无疑问，作者的意图是将梅农向“同性”倾向转变的原因归结于政治制度和文化准则问题。

四、“他者”身份的认同之路

在这两部作品中，男同性恋者的身份受到种族、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从酷儿理论角度来看，新加坡人对于殖民地的西方男性来说是第一类“他者”，是被影响和改变的他者。被资本主义奴役的普通人相对于站在政治和资本顶端的新加坡人来说则是第二类“他者”，是被剥削的他者。而新加坡男同性恋群体相对于普